

018418

主 编 杨伟光

副主编 章壮沂 罗 明 王 录 王 甫

# 中央电视台发展史

ZHONGYANGDIANSHI TAIFAZHANSHI



1958-1998

跨世纪电视丛书

KUASHIJI DIANSHI CONGSHU

北京出版社



---

# 中央电视台发展史

---

主 编：杨伟光

副主编：章壮沂 罗 明  
王 录 王 甫

北 京 出 版 社

乙



---

《跨世纪电视丛书》编辑委员会

---

主任：杨伟光  
副主任：赵化勇 刘宝顺 李 丹 刘宜勤  
李东生  
编委：杨伟光 赵化勇 刘宝顺 李 丹  
刘宜勤 李东生 陈 君 贾文增  
万迪基 李 建 胡 恩 朱继峰  
邵昌有 罗 明(常务) 刘广全  
李晓明 南玉敏 张海鸽 王晞建  
许二春 孙玉胜 阎连俊 高长龄  
赵宇辉 邹友开 余培侠 谭希松  
何宗就 李旋宗 丁文华 王 录(常务)

---

《跨世纪电视丛书》编辑部

---

主任：王 录  
副主任：王 甫 王亚平 孙秋萍  
出版统筹：尹桂馥 朱 宁 苏 英  
资料编辑：刘 珊 周 滢 周金华  
编 务：李 鹏 汪江波 寇宇红



---

《跨世纪电视丛书》编辑委员会

---

主任：杨伟光  
副主任：赵化勇 刘宝顺 李丹 刘宜勤  
李东生  
编委：杨伟光 赵化勇 刘宝顺 李丹  
刘宜勤 李东生 陈君 贾文增  
万迪基 李建 胡恩 朱继峰  
邵昌有 罗明(常务) 刘广全  
李晓明 南玉敏 张海鸽 王晞建  
许二春 孙玉胜 阎连俊 高长龄  
赵宇辉 邹友开 余培侠 谭希松  
何宗就 李旋宗 丁文华 王录(常务)

---

《跨世纪电视丛书》编辑部

---

主任：王录  
副主任：王甫 王亚平 孙秋萍  
出版统筹：尹桂馥 朱宁 苏英  
资料编辑：刘珊 周滢 周金华  
编务：李鹏 汪江波 寇宇红



---

《中央电视台发展史》

---

主 编：杨伟光

副 主 编：章壮沂 罗 明 王 录  
王 甫

编 审：张复华 宋连昌 寿沅君  
张家成 周金华 王 娴  
马超曾 周 经 郭镇之

执行编辑：李 鹏

出版统筹：尹桂馥 李 鹏

资料编辑：王亚平 李秀英 张 梅

# 《中央电视台发展史》撰稿人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宝富	马国力	马超曾	王  娴	王旭东	王  晰	王坚平
王刚建	王国佑	王金秀	王亚莉	王效杰	王贵亮	王晞建
尹学东	石丽萍	申翠海	叶启森	田盛华	冯万友	匡  镛
朱夏初	朱景和	朱慰中	刘小京	刘中胜	刘效礼	刘洪志
刘晓如	刘宝祥	刘建鸣	刘民朝	刘家俊	江  流	邹友开
汪保国	孙克文	孙玉胜	孙文琐	孙素平	寿沅君	苏文秀
杜长彬	杨一龙	杨  菁	杨伟光	杨  瑞	杨沛德	李  枫
李  虹	李  栋	李玉文	李小沛	李建成	李  鹏	李树声
李宝珊	李海明	李福成	李景琴	肖建生	吴继尧	吴明训
何新宇	何宗就	余培侠	汪  恒	宋连昌	宋春霖	张  旭
张大勤	张步冰	张宝安	张复华	张家成	张翔升	张海鸽
陆海亮	陈凤龄	陈林蔚	林庆章	罗  琴	周  经	周金华
郎  昆	房纪庆	封立男	姜柏宁	赵宇辉	赵淑静	胡迎节
胡竞霜	柳成伟	贺常余	贾志杰	顾  军	徐  威	徐建春
徐家察	徐雄雄	翁颖莉	高东生	高广远	高  峰	郭文慈
黄一中	黄  伟	黄瑞刚	常志成	康纯生	章  珺	章壮沂
梁迎利	梁晓涛	续建勇	韩金度	蒋建忠	粟于钊	程仁沛
蔺兴汉	缪暑金	樊必智				

## 总 序

杨伟光

总  
序

当《中国电视论纲》和这套《跨世纪电视丛书》的其他书稿放在我的案头的时候，离中央电视台成立40周年的日子已经近了。夜深人静审读这部书稿之时，便想起恩格斯的那句名言：“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sup>①</sup>的确，在香港百年回归、长江三峡大江截流、伊拉克武器核查事件等电视现场直播报道中，中国电视站在世界重大事件的报道现场，在信息传播中显示了与中国这个泱泱大国相应的风范和地位。然而，这仅仅是表明了中国电视传播实践的进步，中国电视理论思维的进步则是另一项浩繁的工程。在中国电视事业巨大发展的背后，该有一种怎样强大的理论力量作为它的支柱和灵魂呢？如今，当这套凝聚着电视工作者理论建树和实践总结的著述即将付印时，我不禁在思量：我们究竟是已经站在了科学的高峰，还是只是开始了对这一高峰的攀登？我衷心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在改变中国电视传播实践突飞猛进而理论研究相对滞后的问题方面，能做出应

<sup>①</sup>《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6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

有的贡献。让我们在电视精品迭出的同时，能有一部无愧于伟大时代的电视理论之作，以便推动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电视事业登上新的高峰。

### (一)

这套丛书中的《中国电视论纲》的创意策划是从1995年开始的，当时，我们把这一课题定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电视理论”。在课题组成立的会议上，我作了个发言，题目是《加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视理论的研究》。这以后，在1996年和1997年召开的两次规模较大的论证会上，我和专家们一起研讨。我们之所以下决心并准备花大气力把这个课题做好，或者说这一课题从最初的立意到认识的不断深化，是因为有两种考虑：

一是中国电视走过了40年的发展历程，其间所经历的一切，既不全是坦途，也不都是曲折，那些宝贵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是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电视事业的实践中获得的，是我们的一笔十分宝贵的财富。当代电视工作者有责任、有必要、有能力认真总结这40年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将其留给后人，留给历史。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电视台，完成这一任务是责无旁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是要认真回顾和总结

中国电视事业发展的经验教训的。这是一个在较高层面上的深入思考，它有助于我们摆脱那种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

二是进入不惑之年的中国电视事业正处在一个新起点上，这个新起点的标志不仅是世纪之交的时间概念，而且是如何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电视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中国电视如何抓住世纪之交的历史机遇而不丧失机遇？怎样开拓进取而不因循守旧？我们应当坚守的理论起点和实践归宿何在？中国电视如何在现有基础上迎接下一世纪的挑战？这些问题都是不容回避的，都是必须回答的。我们的视野和努力诚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sup>①</sup>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书既要“继往”，更要“开来”。如果说，今天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是原有的电视理论所无法预测和解释的，那么，这部书应当以自己特有的、富有前瞻性的理论预见，在21世纪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中显示出其应有的重要地

<sup>①</sup>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日报》1997年9月22日。

总  
序

位。特别是在这世纪之交，我们研究的视野还应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台湾地区。

可以说，我们之所以写这本书，是缘于：对中国电视理论发展的现状不满足，对电视理论远远滞后于电视传播实践的“落差”不满足，对轻视理论的短视与浅薄不满足。一切创造都是历史的延续，一切创造又都是从不满足开始。我们决心在发挥系统优势的同时，集中全国致力于电视理论研究的精兵强将，下大功夫来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视理论课题的研究。同时，编辑出版《跨世纪电视丛书》，主要回顾近五年来中央电视台的发展历程，总结成绩和经验。

在这套丛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们始终把握了这样一条基本理论线索：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认真分析中国电视事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事实雄辩地证明，鲜活的理论与具体的事业结合恰当而紧密时，往往能对这项事业产生强大的推动作用，使之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在当代社会，理论对具体事业的指导作用更加重要，更加突出。这些年来我们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根本指导方针，努力把中央电视台建设成宣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阵地的实践，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

系。尽管小平同志对电视宣传工作的直接论述和指示并不很多，但他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他关于意识形态、文艺创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都对电视宣传事业有着深远而现实的指导意义。在目前这个中国电视事业正当大发展的时期，邓小平理论对其发展战略、节目生产、改革方略和队伍建设等重大问题，都具有更为实际的指导意义。

有了邓小平理论这一统领全书的指导思想，我们对中国电视事业发展中的许多具体问题也就有了基本的观察视角和理论根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也是中国电视事业不断发展和持续繁荣的根本所在。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同为大众传媒，1958年诞生的中国电视尽管也曾在“文革”中受到严重摧残，但与其他新闻媒介相比，由于中国电视在改革开放前普及的程度还很低，因而历史的负担并不很重。这更有利于突破与创新，更有利于成长与发展，更有利于接近新闻战线解放思想的本质——传播政府的法律、社会公德，尊重人民的知情权，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信息和文化需求。因此，对于束缚电视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对于处于探索阶段的东西，我们判定其是与非的重要根据就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著名的“三个有利于”。在《中国电视论纲》中，我们进一步把它具体化为：是否有利于电视事业的发

## 总

## 序

展壮大,是否有利于提高节目的质量、满足群众对电视文化的需求,是否有利于调动电视从业人员的积极性。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作为全书的基本指导思想,我们始终不忘对历史的尊重和对实践的尊重。党的十五大报告在阐述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时,提出了有两部“宣言书”:一是1978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二是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前者“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后者“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sup>①</sup>这两个宣言书对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第一个宣言书是中国电视在80年代拨乱反正,使电视飞速发展成为重要传媒的政治保证;第二个宣言书则为中国电视在90年代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进而走向世界扫清了思想障碍。

<sup>①</sup>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日报》1997年9月22日。

以中央电视台新闻改革为代表的中国电视改革，在90年代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1993年《东方时空》的开办为标志，我们尝试着抓一些领导重视、群众关心、普遍存在的问题，结果受到领导的肯定和群众的欢迎。第二个阶段，自1994年起，我们开办了《焦点访谈》，把一些大家关心的问题安排在黄金时段里面播出，力争作比较有分析深度的报道，引起了领导和群众的关注。第三个阶段，即两年以后，我们开始做《新闻调查》（因为《焦点访谈》毕竟只有13分钟，要对一些社会问题进行全面的解剖和分析就比较困难），现在看来《新闻调查》已经站住了，这个节目可以与世界的一些大的电视台名牌节目相比，这是难度较大的节目。

马克思曾经说：“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sup>①</sup>如果说，20年前的那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就是划破中国苍穹的思想闪电，那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则是20年来中国大地发生巨大变化、充满发展活力的源源不断的动力。“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新时期中国电视事业每上一个新台阶，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离开了解放思想、实事求

<sup>①</sup>《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

是，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真理是朴素的，弄通了一个道理，就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中国电视事业发展需要的首要条件不是技术和设备，而是需要勇气——包括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和实践勇气。一代又一代中国电视人都应当牢记：真理无穷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无止境，失去了开拓的勇气和科学的精神，我们的事业就没有生气。

也许是偶然的巧合，也许是恰逢其时，《中国电视论纲》策划、研讨、写作的三年时间，也正是中国电视事业高速发展的三年。尤其是1997年，被誉为中国电视的“现场直播年”。以重大新闻的电视直播为标志，中国电视传播越发显得大气磅礴、波澜壮阔。通过电视传播实现的那些堪称中国新闻史上的创举，极大地鼓舞和激励着写作本书的专家学者。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可因循守旧，这一原则已成为他们的行动自觉。可以说，本书写作的过程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过程，就是遵循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辩证法与认识论的统一原则，来探索中国电视发展中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有益尝试。

理论的升华和飞跃依赖于实践的丰富和创造。中国电视传播中一系列成功实践和重大突破，为电视理论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发展道路。尽管《跨世纪电视丛书》向人们展示的仅仅是中央电视台近年来的一些成功实

践，但它毕竟是中国电视事业这部气势宏大的交响乐中最激动人心的乐章。它在向世人展示本世纪中国人民前进道路上第三次历史性巨变的壮丽画卷时，也对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难能可贵的历史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跨世纪电视丛书》为《中国电视论纲》提供了丰富的感性材料，而《中国电视论纲》又浓缩了《跨世纪电视丛书》的实践精华，两者互为因果，相得益彰，是中国电视事业世纪之交时代风貌的一幅生动缩影。

## (二)

新时期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探索过程，这个过程伴随着我们对中国电视事业发展中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上的不断深化。

中国电视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的报告中要求：“新闻宣传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实事求是，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sup>①</sup>这些由中国电视事业性质和任务所决定的原则必须坚持，这是毋庸置疑的，是不能动摇的。中国是一个逐步走向健全的法制的社会，喉舌的性质从根本上讲是与法制社会的基本要求相一致的。

<sup>①</sup>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日报》1997年9月22日。

总  
序

我们认为，中国电视必须在中国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来工作。坚持喉舌的性质，就必须坚持法治而不是人治，就必须宣传贯彻国家的一系列法律规定。这不仅是理论认识上的深化，而且是电视实践发展的必然。比如，《焦点访谈》中许多舆论监督的事例之所以搞得很好，原因就在于这种监督所依据的是法律的规定，而不仅仅是一种义愤，也不仅仅是电视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我们就是要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高度去理解“喉舌”，认识“喉舌”，充分发挥喉舌的正常功能。

在《中国电视论纲》中，我们结合新时期的时代特点，较为全面地论述了电视工作的党性原则。我们认为：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世纪之交时党性原则的最高体现。电视对党的基本路线以及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必须旗帜鲜明，这是中国电视工作党性原则的核心内容。

我们党的惟一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电视要真正做到在政治上思想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就必须全面、准确、迅速、生动地表现人民群众的火热生活，反映他们的意见、要求和愿望，始终同人民群众心心相连，始终扎根于当代实践。这是真正坚持电视工作的党性原则的重要内容。

从当代人民群众的实践角度去阐述党性原则的意义何在呢?从电视传播的成功实践来看,这有助于我们解决一个长期困扰新闻界的老问题,就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和呼声的一致性问题,就是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与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问题。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声音,这也是党的喉舌的重要表现。传播党的声音和传播人民群众的声音高度的统一才是党性的生动体现。以中央电视台的《生活空间》栏目为例,经过反复的摸索,这个栏目定位为“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从而改变了原来居高临下的与老百姓距离较远的状况。由于这个栏目内容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因此受到了海内外观众的普遍认可和欢迎。

人民是电视的主人。中国电视现代化的根本标志之一在于,电视传播同样应当将人民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拥护不拥护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通过电视手段及时、形象、准确地反映社会生活,确立人民群众在电视传播中的主体地位,这是中国电视的基本属性的要求。电视传播必须牢固地树立群众观点,始终不渝地洋溢着一种平民情结,从群众的实践中汲取智慧和营养。重要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人民群众的要求要有地方提,委屈要有地方说。中国电视节目一中一